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村民获得感研究

——以罗田燕儿谷为例

周思齐 叶俊 冯源 王颖¹

(黄冈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 以燕儿谷国家森林公园康养基地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 探析了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获得感。研究表明, 1. 燕窝垵村村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主要来自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精神文化五大效益; 2. 村民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是造成村民对乡村旅游五大效应感知差异的重要原因, 其中性别、居住时间、收入来源和家庭收入变化对村民效益感知差异存在较大影响, 年龄及学历对村民乡村旅游扶贫效益感知的影响则非常小。

【关键词】: 社区参与 乡村旅游 村民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 F590.1 **【文献标识码】** A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乡村旅游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备受关注。而当前乡村旅游尚处于粗放发展阶段, 有效测评乡村旅游的村民获得感是评判其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长期以来学者们通过研究, 认为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乡村地区生产总值、减少人口收入差距, 具有消除贫困的巨大潜力; 但仍存在部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经济漏损的情况, 对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存在较大影响; 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则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后, 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会得到优化和改善, 但同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文化风险, 如民俗文化变质、因过分商业化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价值、增大贫富差距、增加犯罪率等潜在风险。虽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各有不同, 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也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政府支持情况、资源环境、社区参与以及居民的参与程度来决定。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湖北省罗田县燕儿谷骆驼坳村居民参与下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带来的获得感来展开研究, 希望可以为后续促进该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燕儿谷国家森林公园康养基地位于湖北省黄冈市, 隶属于罗田县骆驼坳镇燕窝垵村, 所在村曾是湖北省建档立卡旅游扶贫重点村, 版图面积 9.6km², 全村人口 1368 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 121 户, 总计 385 人, 是罗田县出了名的“国定”贫困村。景区主要由燕窝垵村返乡能人徐志新创建, 该公司于 2011 年创立, 同时采取“公司+集体+农户”的模式运作, 村支部与公司联合党建、联合决策、联合规划、联合投资、联合办公、联合生态保护、联合提供就业创业条件, 迅速带动农户参与进来。通过创新村企联建机制、鼓励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精心打造茶梅小镇、徐家老屋、“九佬十八匠”工匠学校、梅岭、桃花坞等特色旅游产品, 全力建设以观光旅游、园林绿化、研学培训、康养服务、手工艺非遗项目展示与传承、农特产品生产及销售为主, 集农、旅、

作者简介: 周思齐(1998-), 女, 湖北黄冈人, 黄冈师范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2017 级本科生。叶俊(1981-), 女, 湖北鄂州人, 黄冈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乡村旅游、社区旅游等。

基金项目: 2019 黄冈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S201910514015);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重点项目(20D097); 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别山旅游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2014803); 2021 年黄冈师范学院高级别培育项目(202110904)

文、养、教五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基地，从而在该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2016年，该村被确定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同时被授予“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荣誉称号，乡村旅游项目已经成为助力当地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2019年燕窝垵村片区带动返乡农民工本地就业164人，充分解决当地居民就业难、收入低的问题。2019年，燕窝垵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5000元，远超国家规定最低扶贫标准，实现全村脱贫。2020年罗田燕儿谷产业扶贫模式入选国务院扶贫办产业扶贫典型案例。

2 数据来源及分析

2.1 研究方法

借鉴相关学者关于乡村旅游村民获得感的评价指标，文章分别从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及精神文化五个方面设计了21个评价指标，通过向当地居民发放调查问卷获取一手资料。数据回收后运用SPSS20.0数据分析软件，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测量指标进行分类分析，并采用Cronbach α 系数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检验，对数据进一步处理。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采用1分(非常反对)、2分(反对)、3分(中立)、4分(赞同)、5分(非常赞同)进行打分。

2.2 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工作于2021年1月8日-2021年1月10日进行，共3天，调研主要涉及到罗田燕儿谷燕窝垵村13个组，发放问卷230份，11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219份，有效率为95%，基本信息调查结果见表1。调查对象中男性占比35%，女性占比65%，男女比例为1:2，通过走访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该村留守的大多是女性，乡村旅游项目给部分家庭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但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仍会选择外出务工补贴家用，留在村里的女性工作主要是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中。借助燕儿谷的乡村旅游平台，村里的娱乐活动增加了不少，使村里的基础设施等基本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环境卫生得到治理，生态环境日益改善，村民的获得感显著提高。

表1 被调查村庄人口基本信息

项目	类别	人数(个)	比例(%)
性别	男	77	35.16%
	女	142	64.84%
年龄	18岁以下	5	2.28%
	18~30岁	61	27.85%
	30~45岁	63	28.77%
	45~60岁	58	26.48%
	60岁以上	32	14.61%
学历	初中以下	97	44.29%
	高中/中专	86	39.27%
	本科/大专	35	15.98%

	研究生以上	1	0.46%
居住时间	小于 10 年	40	18.26%
	10~30 年	65	29.68%
	30~50 年	64	29.22%
	50 年以上	50	22.83%
收入来源	务农	53	24.20%
	外出务工	94	42.92%
	民宿/农家乐	84	38.36%
	景区工作人员	53	24.20%
	商店	28	12.79%
	其他	16	7.31%
家庭月收入	2000 元以下	36	16.44%
	2000~4500 元	98	44.75%
	4500~8000 元	77	35.16%

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表 2),大多数村民都高度赞同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影响,特别是疫情期间出行受限的情况下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更是其创收的一大来源;在社会文化方面,村民都赞同开展乡村旅游进一步丰富了其文化生活,如与邻村相比有更多的文娱活动下乡,传统艺人备受重视;在公共服务方面村民认同乡村旅游使村里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如旅游公交车直达村里,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在生态环境方面,村民都赞同乡村旅游提高大家的卫生与环保意识,但是在土地利用程度以及动植物的保护措施方面评价较差,从走访情况来看,这是因为尽管征收了村民的土地也利用了一些荒地用来种植和开发,但是规划工作涉及面较窄,没有辐射到全村范围;在精神生活方面,大部分村民都有很高的幸福感,以生活在燕儿谷为自豪。

表 2 燕儿谷村民对乡村旅游效应的获得感

感知分类	包含关键题项	非常赞同	赞同	中立	反对	非常反对	均值
A 经济影响	A ₁ 村里人的工作逐渐转变为与旅游相关	41	117	56	4	1	3.88
	A ₂ 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	50	129	35	3	2	4.01
	A ₃ 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	48	147	20	2	2	4.08
	A ₄ 带动了本地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48	128	35	6	2	3.98
B 社会文化	B ₁ 本地手工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49	108	57	3	2	3.91

	B ₂ 当地休闲娱乐活动增多	56	118	41	2	2	4.02
	B ₃ 文化建设、旅游广告等宣传栏数量增多	65	121	30	1	2	4.12
	B ₄ 当地会说普通话的人数增加	62	107	47	2	1	4.04
C 公共服务	C ₁ 当地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82	102	32	1	2	4.19
	C ₂ 燕儿谷居民应该积极参与村内旅游发展建设	70	117	30	0	2	4.16
	C ₃ 本地治安管理力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60	122	35	1	1	4.09
	C ₄ 文化广场等娱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67	116	32	2	2	4.11
D 生态环境	D ₁ 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卫生治理条件有所改善	74	118	26	0	1	4.21
	D ₂ 原生态动、植物资源得到更好保护	54	102	51	11	1	3.90
	D ₃ 居民的环保意识提高	57	122	38	1	1	4.06
	D ₄ 土地利用程度提高	44	96	64	14	1	3.77
E 精神文化	E ₁ 村民在村委会的话语权增多	40	74	91	10	4	3.62
	E ₂ 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提高	57	121	34	6	1	4.04
	E ₃ 本地的知名度获得提高	79	118	20	1	1	4.25
	E ₄ 村民的幸福感得到了提升	66	119	29	4	1	4.12
	E ₅ 村务事务的公开透明度提高	28	76	97	14	4	3.50

3 村民乡村旅游获得感差异分析

利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将调查问卷中 21 个评价指标结果进行分析归类,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利用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对提取的 219 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了因子可行性分析,再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经过数据分析 KMO 检验结果为 0.89,调查问卷信度为 0.924,信度较高,5 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4.317、3.435、2.582、2.29、1.852,因此可以初步认定 5 个因子,21 个评价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其相关关系。且 21 个指标的因子载荷数较高,提取结果比较理想。不同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对燕儿谷乡村旅游效应感知存在一定的影响,同一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对于不同维度影响的显著性差异。

3.1 性别与村民获得感的差异

燕儿谷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面向男性居民所提供就业岗位的类型和薪酬相较于女性而言更高,因而男性居民在此题项上的获得感更强;在“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和“生活环境卫生治理条件有所改善”两个题项上,男性居民的获得感仍高于女性,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女性,男性居民对外界的变化更加敏感,因而男性对于村内的交通条件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更加关注,其获得感也会更强。

3.2 年龄与村民获得感的差异

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的燕儿谷居民对于乡村旅游效应获得感在经济影响、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和精神文化 5 大效应层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得知，燕儿谷乡村旅游获得感不会因年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

3.3 居住时间与村民获得感的差异

居住时间不同的村民对于燕儿谷乡村旅游扶贫效益的感知，在经济发展维度、公共影响维度层面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性。比较分析发现，居住时间在 10 年以下的村民乡村旅游扶贫效益获得感明显低于居住时间超过十年的村民，居住时间大于 10 年的村民普遍具有较高的获得感。究其原因，可能是燕儿谷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展时间导致的，居住时间大于 10 年的村民对于燕儿谷的变化有更为深刻的感知。

3.4 学历不同与村民获得感的差异

学历层次不同的村民对于燕儿谷乡村旅游项目发展的效益感知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维度上，初中以下的村民对于村里更多人从事旅游工作、增加了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的感知更加强烈，这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村民对于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愿望更加迫切，对于就业与收入增加更加敏感。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学历更高的村民群体对于“会说普通话的人数有所增加”的感知度更加深刻，而学历更低的村民群体对于“宣传栏数量增多”更加敏感。在公共服务维度上，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对于“居民应该积极参与燕儿谷的旅游发展建设”的感知差异并不大，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村民普遍认为应该积极参与旅游建设，从旅游开发中可以增收致富。在生态环境维度上，文化程度更低的村民在“生活环境卫生治理条件有所改善”的满意度更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村民，对于村周围环境卫生治理的关心程度较低，因而环境的细微变化更容易使其满意。在精神文化维度上，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在“本地的知名度获得提高”的获得感更强，而村民在“村民的幸福感受到提升”指标上的感知差异并不显著，近年来，随着燕儿谷旅游扶贫投入的加大，村民的就业机会更多，增收致富的渠道更广，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均能有机会参与旅游，因而其幸福感差异并不太大。

3.5 收入来源变化与村民获得感差异

不同收入来源的村民对于燕儿谷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效益具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对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精神文化四个维度的获得感差异不明显。对比分析发现，在经济影响方面，收入来源由务农和外务工转向景区工作人员、农家乐及商店的村民所感知到的经济效益远高于收入来源未发生变化的村民，这可能是由于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展诱使村民改变经济收入方式，迎合游客消费需求造成。

3.6 家庭收入变化与村民获得感差异

不同家庭收入阶段的村民对于燕儿谷乡村旅游发展的五大效益维度的获得感是存在差异的。对比分析发现，家庭收入获得提升的村民在经济影响和精神文化影响方面的获得感具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家庭收入由 2000 元以下提升至更高阶段的村民在这两个维度的获得感最高，相反极个别家庭的收入因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而降低的村民则对经济影响维度的获得感极低，对其他维度的感知差异并不太大。

4 结语

鉴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 乡村旅游效应的感知需要着重关注村民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影响、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精神文化五大层面，尤其是经济影响层面和社会文化影响层面；2. 乡村旅游项目建设需要更注重村民的个人因素，包括村民的性别构成、居住时间、职业及家庭收入等相关因素，满足更多村民获得发展的需求，提升村民对乡村旅游项目发展效应的感知；3. 本研究调查发现学历因素对于村民获得感的影响不大，依靠村民自身素质提升提高参与度和获得感较为缓

慢, 则需对村民开展相关培训、动员大会, 广泛让村民认同且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 通过提升村民参与能力而提升村民获得感。

参考文献:

- [1]叶俊.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15, 54(07):1766-1769.
- [2]赵黎明. 发展乡村旅游改善农村民生[J]. 旅游学刊, 2010(09): 8-9.
- [3]叶俊. 大别山试验区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麻城龟峰山风景区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14, 53(13):3187-3190.
- [4]Matthew J. Walpole, Harold J. Goodwin. 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dragon tourism in Indones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03): 559-576.
- [5]张小利. 西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分析[J]. 商业时代, 2007(07):89-91.
- [6]Geoffrey Wall.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in selected Balinese villag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01): 123-137.
- [7]冯灿飞. 贫困型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及规范研究[J]. 特区经济, 2006(05):200-201.
- [8]常慧丽. 生态经济脆弱区旅游开发扶贫效应感知分析——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10):125-130.
- [9]Ritchie J. R. Brent. Consensus policy formulation in tourism: Measuring resident views via survey research[J]. Pergamon, 1988, 9(03):199-212.
- [10]Victor Teye, Ercan Sirakaya, Sevil F. Sönmez.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03):668-688.